



盖宽饶像

所以不敢不说。
郑昌的求情没有挽救盖宽饶的命运。后世学者苏辙甚至认为，郑昌的求情涉及“许、史、金、张”等权贵家族，也许让宣帝更加恼怒，反而成了盖宽饶的催命符。
皇帝执意要把盖宽饶送往刑狱问罪。盖宽饶不愿受此屈辱，在宫殿北阙门下引佩刀自刭，终年45岁。当时百姓听闻此事，“莫不怜之”。

## 身死节存，后人推崇

盖宽饶自刎明志后，在朝廷内部引发不小的风波。

史学家司马迁的外孙杨惲，平素就与盖宽饶友善。他生性豁达，恃才傲物，有时甚至拿皇帝开玩笑，因而被人检举而免为庶人。盖宽饶死后，杨惲的族人以盖宽饶作为前车之鉴，规劝他收敛性情：“盖司隶、韩冯翊皆尽力吏也，俱坐事诛。”杨惲不为所动，依旧故我。后来，杨惲被判大逆不道，最终腰斩。

当时的皇太子后来的汉元帝，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，以刑名绳下，大臣盖宽饶等人仅因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，内心有所不忍。他趁着在宣帝左右时婉言劝谏：“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”宣帝却脸色突变，愤愤然道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道教，用周政乎！且俗儒不达时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？”宣帝还叹息道：“乱我家者，太子也！”但随着时间推移，盖宽饶为官的价值和意义不断得到世人认同。

在《汉书·盖宽饶传》的末尾，班固对盖宽饶有高度评价：盖宽饶为司臣，正色立于朝，虽《诗》所谓“国之司直”无以加也。若采王生之言以终其身，斯近古之贤臣矣。

隋唐已降，盖宽饶越来越成为文人乃至皇帝心目中直臣的代表。

中唐诗人刘禹锡感叹：“文轻傅武仲，酒逼盖宽饶。”晚唐诗人皮日休也悲呼：“无限玄言一杯酒，可能容得盖宽饶。”

宋仁宗时，皇帝提拔太常博士梁适为右正言，在谏院供职。有一次他和其他大臣上殿奏使臣何次公案，仁宗随口询问：“（何）次公似是汉时人乎？”其他大臣答不上来，只有梁适对答说：“盖宽饶、黄霸皆字次公。”盖、黄二人都是西汉时期著名的直臣。梁适还认为，何次公的父母应该是仰慕盖、黄二人的政德，所以给儿子取名次公。仁宗听后非常高兴，认为梁适是见解卓越的人才，就询问他的家世，擢升其为提点京东刑狱。梁适后来任太子太保，晋升太傅，成为一代名臣。

宋神宗时期，苏轼因乌台诗案而下狱囚禁。他在自己的辩解书中，也多次引用盖宽饶无辜身死的事例。比盖宽饶幸运的是，苏轼最终重获自由。

两千多年的光明侵蚀了往日的遗存遗迹，但盖宽饶的形象却始终清晰在族人的内心。采访结束后，75岁的盖立昌执意将我们送至村外。他告诉我们，自己打算号召族人重修家谱，让盖氏源流更加透彻清晰。

发内心不满，说了许多诽谤朝廷的话。
杨惲在信中言辞激昂，说自己“遭遇变故，横被口语，身幽北阙，妻子满狱。当此之时，自以夷灭不足以塞责，岂意得全首领，复奉先人之丘墓乎”？西汉时期刑罚严酷，大臣时常遭遇杀戮。杨惲能免为平民，已经算是虎口逃生。但杨惲始终觉得自己是无罪免官，所以变成农夫实在凄凉。而朋友觉得他招人耳目，更让他觉得难以接受。

杨惲在书信中，介绍自己的庄园生活，有“奴婢歌者数人，酒后耳热，仰天拊缶，而呼鸣鸣。其诗曰：‘田彼南山，芜秽不治，种一顷豆，落而为萁（豆竿）。人生行乐耳，须富贵何时……’”之语。

这首名为“拊缶歌”的自娱歌曲，成了杨惲后来身死的关键。从表面看，它只是反映一个官员落难，突然去做庄园主的艰难悲楚，不含任何政治深意。
但在今文经学盛行的西汉，许多事务都被赋予了政治含义。到了魏代，经学家张晏在注释《汉书》时，保留了其所获得的解读信息：“山高在阳”，人君之象也；“芜秽不治”，言朝廷之荒乱也。“一顷”，百亩，以喻百官也。言“豆”者，贞实之物也，当在仓，“零落”在野，喻己见弃也。“萁”曲而不直，言朝臣皆谄谀也。

经过今文经学莫名其妙地解释，这首原本歌咏农夫生活的诗歌，一下子饱含讽刺朝政、诋毁帝王的深意。怪不得汉宣帝“见而怒之”，最终判处杨惲腰斩了。

# 齐鲁人文

## ■ 政德镜鉴 ⑩

他因刚直的品性而得到帝王赞赏，监察百官不遗余力，被后世视为直臣的代表。但耿介的性情让他树敌太多，终因失言而引来杀身之祸。

# 盖宽饶：刚直耿介，直臣表率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 张环泽
本报通讯员 徐琦

滕州市滨湖镇后盖村，是西汉宣帝时期著名直臣盖宽饶（字次公）的故乡。不过，如今的后盖村，绝大多数人家都姓王，已经找不到一户盖姓人家。86岁的村民王慎文带着记者，穿过一段荒草小径，找到了一块重立于1994年的石碑。“碑文记载在明太祖洪武年间，我们的祖先王从政携家眷，于山西洪洞县出发，来到这里安家落户，自此在后盖村繁衍兴旺。”王慎文说。

后盖村之邻，有东盖、西盖二村。两村与后盖一样，多为王姓而无盖氏。为何盖村无盖姓，王慎文也不太清楚。他告诉记者，在东边数公里外的阳温村，还居住着近千名盖姓村民。滕州文史研究专家李庆翻阅古籍，证实西盖村后曾有一座“盖氏先莹碑”，“但目前此碑已不见踪迹，盖氏后人确实集中在阳温村”。

记者随后来到阳温村，边走边寻，终于找到了曾参与编修本族家谱的盖氏后人盖立昌。他告诉记者，自从盖宽饶自杀明志后，盖氏后人便辗转流离，其中一支到了这里。“盖宽饶是我们家族的历史名人，也是我们家族气节的代表。”盖立昌手捧家谱，轻翻至盖宽饶传记页，温柔地婆娑着。

## 师承名门，以儒入仕

后盖村虽然已无盖姓，但这里确实是盖宽饶的故乡。西汉武帝时期的滕州，花木扶疏，草屋棋布，颇有世外桃源的感觉。盖宽饶在这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。他眨着稚嫩的眼睛，好奇地打量着四周，向往着村外新奇的世界。

盖宽饶长大后，听闻滕州东南方向的兰陵，有位叫孟喜的儒生擅长讲授《周易》。他决定负笈前去拜师。

孟喜师承名门，是西汉第一位易学家田何的再传弟子。他虽然学术精湛，却利欲熏心、私德有愧，为了拔高自己而不遗余力。孟喜伪造履历材料，自称独得师傅田王孙（田何弟子）的真传：“师田王孙，且死时枕（孟）喜膝，独传喜。”孟喜想假借老师的声望，通过编造故事来抬高自己的学术地位。但这种粗陋的伎俩很快被揭穿，同门梁丘贺质疑他：“田生绝于施仇手中，时（孟）喜归东海，安得此事？”此外，孟喜还不顾“师法”尊严，主动接受异端邪说。他“得易家阴阳灾变书”，以阴阳灾异解说《周易》。这在视“师法”为圭臬的西汉，是断不会被主流舆论所接受的。

盖宽饶追随孟喜学习《周易》一段时间后，也



后盖村所立石碑记载了王氏落户经过 鲍青 摄

发现老师品行的种种不端。盖宽饶生性刚直，看不惯老师的所作所为，就有了转投他处的念头。

盖宽饶后来看到著名经学家韩婴的后人韩生所传《周易》，更为纯粹精妙，就决定脱离孟喜，向韩生学习《周易》。因为先后获得两位名师的指点，盖宽饶对儒家经典的见解日益精进。家乡的百姓，开始把他视为道德纯粹的“儒生”。

因为通晓经术，盖宽饶声名日盛，被举荐为魏郡文学，专司所辖地域的教育行政事务。他又因品行端正、政绩突出，被当地向朝廷举荐为孝廉。

西汉时期，孝廉评选标准较高，考察严格，是选拔官吏和任用升迁的清流正途。盖宽饶成为孝廉后，很快被任命为郎官。郎官常有出任地方长官的机会，被视为升迁的重要途径。

在郎官年度考核考察中，盖宽饶表现突出，“对策高第”，迁任六百石俸禄的谏大夫，又出任郎中户将，负责检查宫门出入。

很快，同僚发现这位新任户将有点不寻常。盖宽饶听闻他人的传言，就敢上疏弹劾阳都侯张彭祖过宫门而不下车。要知道张彭祖老头可不小，他的祖父是武帝时期著名酷吏张汤，父亲是显赫一时的卫将军张安世，而他自己和宣帝感情深厚，曾同在掖庭读书。总而言之，张彭祖可是一个实力派人物。

同僚都为盖宽饶的“鲁莽任性”捏一把汗。不知是盖宽饶一时疏忽，还是宣帝从中干预，有关部门的调查结果证明张彭祖过宫门时确实下车了。盖宽饶因举奏大臣不实，被贬谪为卫司马。

仕途的失意，没有改变盖宽饶的性情。卫屯迎来了一位让所有人都大开眼界的卫司马。

## 特立独行，监察百官

在此以前，卫司马在官衙内的地位很低，即使见到担任警卫工作的卫官也要行拜谒礼。而且卫官还经常欺凌卫司马，私下役使他们上街购物。卫司马即使不愿意也不敢拒绝。

盖宽饶担任卫司马后，情况迅速发生变化。他执意按照从前规定，遇到所有卫官都只行拱手礼。有一次卫官坚持派他外出买东西，盖宽饶就径直来到尚书衙门，以此请求辞职还乡。获悉实情的尚书据此责问卫官，要求在卫屯中根除这条鄙陋的潜规则。经过盖宽饶这番不知轻重的“折腾”，卫司马再也不用行拜谒礼，卫官也不敢私自派派他们。而且以后皇帝出行，卫司马可以按照昔日规定担任先导，还能上呈奏章，地位大大提高。

卫屯里的盖宽饶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奇人”。他不仅行事惊人，为人也很古怪。当时人们“曲裾深衣”，喜欢穿长长的衣服，行动颇为不便。盖宽饶为了方便出门，就减掉单衣的下摆，让它短到足以离开地面。他还喜欢头戴一顶大帽子，身佩一柄大长剑，若无其事地在军营里巡逻查访。

盖宽饶穿着这种“奇装异服”，亲自巡查士兵的宿舍，仔细查看他们的饮食起居。如果遇到身患疾病的兵卒，他还要“抚循临问，加致医药”，一直等到他们康复才安心。

盖卫司马虽然品级不高，但对兵卒嘘寒问暖，很快赢得了士兵的喜爱和信任。等到皇帝在年终换班仪式上犒赏即将退伍的士兵时，在场的几千名士兵齐刷刷地跪地叩头，一致请求再留下来服役一年以报答盖宽饶的恩德。这则“奇闻”很快传遍整个长安城，引发了讨论和争议。有同僚讽刺盖宽饶是在故意“作秀”，靠收买军心来获取政治利益。“但一下子收买数千人难度太大了。而

且从盖宽饶日后的言行来看，他并不擅长故意表演，应该是性格使然。”后人盖立昌说。

同僚的议论并未影响宣帝对盖宽饶的好感。表彰仪式结束后，皇帝就让他担任太中大夫，负责考察各地民情风俗。盖宽饶如鱼得水，一下子表彰举荐了许多人才，也贬斥废黜了许多不合格的官员。因为工作卖力、考察细致，他的建议往往能符合皇帝的心意。

宣帝决定重用盖宽饶，升任他为司隶校尉，负责监察京师和地方百官。盖宽饶似乎就为司隶校尉而生。他性情刚直，眼中容不得沙子，检查和揭发官员过失无所回避。凡是违背法律条文，无论小事大事、无论大官小官，他都要向朝廷具文上奏。

但令盖宽饶颇为寒心的是，案件转交到廷尉手中后，就住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。在武帝巫蛊之祸爆发前，司隶校尉有领兵之权，能率所属徒兵直接逮捕犯人。巫蛊之祸后，朝廷鉴于其权力太大，只保留它的“司察之任”和“举使之权”，威权大大降低。所以盖宽饶弹劾的人虽然很多，但廷尉时常上下其手，对他的意见一半采用一半不采用。即使如此，公卿贵戚以及出使到长安的郡国官吏，仍然非常忌惮盖宽饶，轻易不敢违背禁令。原先权贵横行的京城，变得清平多了。

## 开罪权贵，依然故我

因为脾气耿介、不善交际，盖宽饶在官场几乎没有什么朋友。即使有人好意结交他，最终也会闹得不欢而散。

有一天，宣帝的岳父、平恩侯许广汉乔迁新居，因其身份特殊，朝中大臣趋之若鶩登门道贺，如丞相、御史、将军，以及俸禄为中二千石的官员都去了，许广汉却发现唯独司隶校尉盖宽饶没来，就屈尊纡贵亲自登门邀请。也许因为感情难却，盖宽饶勉为其难登门道贺。他最晚到来，径直从西阶上到厅堂，也不和同僚打招呼，就独自向东而坐。

许广汉为了活跃宴会气氛，亲自斟酒说：“盖君后至（要先饮酒以作惩罚）。”盖宽饶却说：“无多酌我，我乃酒狂。”丞相魏相语带讥讽说：“次公（盖宽饶字次公）醒而狂，何必酒也？”此语一出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，用鄙夷的眼光看着盖宽饶。虽然有人身攻击之嫌，盖宽饶此时却并未作声。
酒兴正浓时，宴会上开始演奏音乐。已经酒酣耳热的长信少府 Chancellor，突然自告奋勇要跳舞助兴，为大家表演猕猴与狗搏斗。 Chancellor 丑态百出的舞蹈，让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。盖宽饶看着 Chancellor 愈发忘我的舞蹈，愤恨实在有失朝廷体统。他仰着头注视着屋顶，叹息说：“美哉！然富贵无常，忽则易人，此如传舍（驿站），所闻多矣。唯谨慎为得久，君侯可不戒哉！”这些话让在座众人鸦雀无声，宴会气氛瞬间变得极为尴尬。

说完这些，盖宽饶就快步走出大门。次日，他上奏弹劾长信少府以列卿身份表演猕猴舞，失礼不敬。皇上本想要降罪少府 Chancellor，但许广汉替他谢罪好久，才最终没有追究。

盖宽饶的孤傲，得罪了 Chancellor，也得罪了许广汉。后来，因为他的不通融，所有的皇亲国戚都怨恨他。

盖宽饶喜欢劝谏政事，时常反对皇帝的决策。宣帝起初觉得他是个儒者，尚算优待宽容，但也决定不再提拔他。盖宽饶看到与自己职位相同或比他资历更浅的人，因为曲意逢迎而官至九卿，内心难免有些失落。有朋友劝他收敛锋芒，学会藏拙，盖宽饶却始终做不到。因为对朝廷政策有所不满，他几次上奏章进行争谏，言辞都有些激烈。

太子庶子王生敬佩盖宽饶品行高尚，却担心他长此以往将有大祸，便写信给他：当今皇帝圣明睿智，知道您品性高洁，清廉公正、不畏强暴，所以让您担任主管检举的司隶校尉，授予您执行皇家诏令的权力。尊官厚禄已施于君，您应当夙夜思考当今朝廷要务，实行政

因为得到皇帝信任，杨惲向朝廷呈请公开外祖父司马迁所著的《史记》。汉宣帝并没有因为曾祖父汉武帝曾反感此书而加以反对。

他只是删除其中几篇文章，就允许书简公开。幸运的是，被删去的如《今上本纪》等文章，后来都被补充完备。

# 杨惲：让《史记》重见天日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被鲁迅先生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的《史记》，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一生的得意之作。但在司马迁生前，因为直谏遭受腐刑，又遇到险恶政治环境，他对这部著作能否流传于世非常担心。未雨绸缪之下，司马迁让尚在身边的女儿司马英将《史记》手稿另抄一份。他将女儿抄写的“副本”留在京师长安，适时呈送给汉武帝审查。他将原稿作为“正本”，秘密送往女儿婆家——“华山脚下”的杨家珍藏。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，他将这种做法隐晦地阐述为“藏之名山”。

事情果然不出司马迁的预料。进呈的那部“副本”后来不知所终，据传遭到了汉武帝的焚毁。而目前流传的《史记》，则是根据司马迁事先藏匿于亲家内的那部“正本”刊印的。

作为付出极大心血的心血之作，作者司马迁并没有等到《史记》流传的那一天。而让《史记》得

以重见天日的，是他的外孙杨惲。

杨惲是司马英的次子。他自幼聪慧，跟随母亲熟读外公的《史记》文稿。外公洋洋洒洒、爱憎分明的叙述风格，让杨惲读得如痴如醉。他自小爱上了《史记》，并开始对许多历史典籍产生兴趣。

因为兄长的引荐，杨惲顺利入仕为官，不久即“以材能称，好文英俊诸儒，名显朝廷”，被任命为左曹。

杨惲的人生转折，缘由一次意义重大的告密。汉宣帝地生四年（公元前66年），霍氏家族意图发动叛乱，推翻宣帝另立他人。杨惲闻知此事，即密告给侍中金安上，金安上再奏宣帝。皇帝得以迅速采取措施，霍氏家族被迅速诛灭。杨惲和金安上因告密有功，皆被封侯。杨惲被封平通侯，食邑博阳，后来又升任中郎将。

因为得到皇帝信任，杨惲借机呈上外祖父的《史记》，希望它能重见天日。此时距司马迁离世

已有20余年，汉宣帝并没有因为曾祖父汉武帝曾反感此书而反对。他只是删除了其中几篇文章，就允许此书简公开。幸运的是，被汉宣帝删去的如《今上本纪》等文章，后来都被补充完备。

杨惲任中郎将期间，理财节用，货赂之端，令行禁止，“官服之内，翕然同声”。因为廉洁无私，有公平公正之美名，他又被擢升为诸吏光禄勋，仕途似乎一帆风顺。

杨惲因一次偶然告密而获利，让他渐渐对告密不可自拔，甚至以告密为己任。凡同僚中有与自己有过节的，他“必欲害之”，通过挖人隐私来获益。而这种扭曲的性格，也让杨惲走上末路。

当时杨惲与太仆戴长乐的关系非常紧张，几乎到了势同水火的地步。不久，有人告发戴长乐曾帮助皇亲贵族私下演习宗庙祭祀的礼仪，有谋反的嫌疑。廷尉审理此案期间，戴长乐认定背后肯定是杨惲告发。他发掘杨惲的过往，密告杨惲种种不端行径。如杨惲看到“高昌侯车奔北掖

门”，就对别人说：“当年有人奔北掖门，然后昭帝就驾崩了。如今又有人往那里去，这是天时，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。”这其实是借昭帝之死来议论宣帝，诽谤当世，有失人臣之礼。
戴长乐还检举杨惲在皇宫西阙观画，指着夏桀、殷付的画像说：“天子过此，一二问其过，可以得师矣！”戴长乐认为西阙有尧舜禹汤等贤君的画像，杨惲却唯独钟意夏桀、殷纣这样的暴君，可见险恶用心。宣帝怜惜两人的才华，不忍加诛，诏免他们为庶人。

杨惲丢官之后，心灰意冷，在家大兴土木，以财自娱。后来友人孙会宗给他写信，劝说他低调从事，“大臣废退，当阖门惶惧，为可悼之意，不当治产业，通宾客，有称誉”。孙会宗希望杨惲能谨慎度日，免得惹人议论，招致灾祸。但杨惲素来性情不羁，对自己被免职又心有不甘，所以借着给朋友写信的机会大

## 清廉如水，自到明志

盖宽饶虽居司隶校尉这样的要职，却从不以权谋私，始终秉承高风亮节，立志为朝廷效力。他每月俸禄一大半都用来聘请百姓和小吏替他侦查治安情况，所以家境一直非常困苦。儿子被朝廷指派到北疆担任守备时，竟然因为贫困而只能步行前往。当时百姓都深深敬佩盖宽饶的公正廉明。

但盖宽饶“耿介”的个性，越来越不能为宣帝所容。

到了统治稳固后，宣帝开始崇尚严刑峻法，以刑法治国御下，并宠信中尚书宦官。这在推崇以德治国的盖宽饶心中，是断难接受的，所以他起草了一份反映自己心意的奏疏。没想到，在皇帝的纵容和群臣的曲解下，这封奏疏将他推向死亡深渊。

盖宽饶究竟在奏疏中说了什么，引起朝廷轩然大波？奏疏的部分原文，收录在东汉班固所著的《汉书》中。

盖宽饶奏疏中抨击朝政黑暗，皇帝诸多决策有所失当：如今圣人传统逐渐废弃，儒家学说得不到施行。以刑罚人为周公、召公这样的圣贤，把严刑峻法当作《诗》《书》这样的经典。他还引用自己曾钻研的《韩氏易传》说：五帝以天下为公，三王以天下为家，以天下为家传给子孙，以天下为公传给贤人。就像四季的运行一样。事功已成的人就离去，不是恰当的人就不在其位。

就是这段话，让盖宽饶惹上了大麻烦。奏疏呈递后，宣帝大怒，认为盖宽饶屡次诬谤朝政，就将这份奏疏下发到中二千石一级的官员那里集中讨论。

因为盖宽饶平素勤于弹劾百官，甚至有些吹毛求疵，因而被群臣视为眼中钉。如今，他们正好借此机会打击报复。执金吾经过讨论，认为盖宽饶此举是妄图想要皇帝退位让贤，属于罪大恶极、大逆不道的行为。

唯有谏大夫郑昌觉得盖宽饶此举纯粹是“忠直忧国”，只是因为言事用词不当，而被文吏所曲解诋毁。他上疏求情：我听说山中有猛兽，藜藿因而不被人摘采；国家有忠臣，奸邪之人因而不敢起来。司隶校尉盖宽饶居住不要求安逸，饮食不求温饱，身在朝廷而有忧国之心，退居田野而有为志节舍生的义气。他上不投靠许、史（西汉外戚）之家，下不接受金、张（西汉权臣）的请托。他本职在于监察，坚持正道做事，仇人郑而党羽少。上奏书陈述国家大事，官吏用触犯大刑的罪名来弹劾他。我有幸得以跟随大夫的后面，担任为谏的官职，